

在“求是”与“致用”之间

——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路径检视

党圣元

摘要:在西方科学主义观念的主导下,“五四”时期形成激进的反传统和重估传统价值的思潮,间接促使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勃兴。“求是”与“致用”是传统与现代之矛盾的派生物,贯穿了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并在其书写路径、运思模式和理论品格上造成大量的问题。其争论点在于,贯彻历史主义的“求是”原则,就必然要求在文学观上采取多元、多样化的立场;主张科学主义的“致用”原则,又会偏离文学批评史的客观性。陈钟凡提出“历史的批评”,郭绍虞主张“批评史路径”,罗根泽倡导“原理路径”,他们都侧重于历史主义的“求是”原则;胡适的整理国故,在方法论上似乎中西兼顾融通,而在世界观、文化观上更倾向于“致用”原则和全盘西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是在“求是”与“致用”之间创立起来的。

关键词:求是;致用;中国文学批评史;历史主义;路径难题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04(2017)05-0133-14

—

对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研究而言,不仅需要时时面对传统与现代之矛盾,更是经常遇上“求是”与“致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矛盾的纠缠。在一定程度上,“求是”与“致用”的矛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也可以说是由传统与现代之矛盾派生出来的,乃是包括古代文论研究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尤其所谓人文学术发展所遭遇的基本的“路径难题”,不同时期这一路径难题的具体表现又有所不同。

我们思考的出发点是:在反传统浪潮高涨的“五四”时期,研究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学

作者简介: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文艺思想编”阶段性成果。

科,为何会迅速得以建构并在其后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成就?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合法性何在?我们知道,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真正诞生正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朱自清在评论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时这样讲道:“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就有些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①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传统文化的怀抱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学科独立和意义释放,反而在“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作全面的批判甚至否定之后,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现代学术中取得独立的学科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迅速发展与推进。按常理而言,这其中不能说没有矛盾,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也正在这里。按通行的说法,作为一门“历史”的、“理论”的学科,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应主要来自对现实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以此而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发展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其合理性似应主要来自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但真实的情况表明这恰恰并非其获得合理性的主要途径。可以先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面看来似乎矛盾的一些现象开始分析,比如当代有人为了给武侠等通俗小说的发展寻求合理性,提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侠义、人情(才子佳人小说包括在内)等诸体小说,分类论述,但鲁迅并未从门类着眼加以抹煞,何满子刊登于《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8日的《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一文分析指出:“《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成就,毫无贬抑之意;但在《叶紫作〈丰收〉序》中,却对‘中国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即早该过时了意识还在困扰现代中国深表怅憾。”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到郑振铎,他对古代通俗文学有专门的研究,而在“五四”之初,他对当时盛行文坛且与古代通俗文学联系甚密的鸳鸯蝴蝶派的武侠小说等,却进行过非常激烈的口诛笔伐;还有如胡适研究《红楼梦》,其动机绝非为了总结曹雪芹的创作经验,以指导当时的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的矛盾大致可以表述为:一方面重视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一方面激烈地批判古代文学传统。当然对此矛盾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解读,其中一种可能的解读是:周、郑、胡等五四先贤研究古代文学的目的,绝非是为了直接指导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因为当时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南,主要来自西方文学而非中国古人,并且主导倾向是为了推崇西方人而不惜贬低中国古人。由此来看,他们研究的目的似乎是“为研究而研究”或“批判性的研究”。当然这一矛盾在胡适这一新派人物身上有着更明显的象征性表现:正是竭力鼓吹“全盘西化”的他又竭力鼓吹“整理国故”。当下,“汉学主义”“汉学心态”在传统文学研究与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盛行,曰之为“古典学”,细究之,并不新鲜,其始作俑者正是胡适之,这是题外之言,略而不表。不管怎么说,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产生的合理性,显然主要不是来自所谓“指导创作”或对其研究对象古代文学中某些审美文化传统的发扬云云。从总体上来说,服务于或配套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的主要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那么在此情势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似乎就缺乏合理性,然而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门重要

①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44页。

学科却得以顺利建制并获得大发展,这只能表明其合理性不是来自指导文学创作之类,而当于别处寻。

黄保真在《回顾与反思》一文中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批研究者进行分析时指出:

研究主体是一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又国学功底深厚的年轻学者。他们既能够学习、运用近代欧洲的文学理论、历史观点、思想方法去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实践,清理理论史料的遗存,又能够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朴学实证的治学手段,沉潜于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中勾稽爬梳,实事求是地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历史性、自体性。……从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不仅成为专门之学,而且有了特点不同的专家之学。但是,这一阶段毕竟是学科的初创阶段,所以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文学观、史学观没有完全摆脱二千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儒家正统、六经中心、诗文正宗等传统观念的羁绊。对戏曲、小说等后起的文学样式及其批评实践、理论建树,基本上忽略了。其次是对概念、命题、流派、专著、理论家的研究,重考核而轻阐释。其三是建构体系的物质载体、符号系统——理论语言,尚多是以古释古,没有根本的系统的创新。^①

当然,黄先生所指出的第一批研究者的“缺点”,从另一角度来看可能也恰恰是后来研究者所缺乏的“优点”。即使在当时,比如胡适等就把戏曲、小说等抬得很高,但因此就认为诗文等一钱不值,后世仿效者不乏其人,然而如此做就只是“优点”了?后来重阐释了但却轻考证、轻文献,是不是也是一病?“系统创新”了但离古人原貌越来越远是不是也是一种“缺点”?凡此种值得加以全面的历史反思,兹故不论。“重考核”与“以古释古”联系很紧,两种情况涉及的是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又能够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朴学实证的治学手段”云云,好像是说在这方面对国学多有继承,而非主要学习西方。但是,这方面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先从分析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建设有创始之功的几位先生的著述开始。

对学科有开创之功的陈钟凡,某种程度已定下了这一学科研究的基调。他强调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众矣,顾或究文体之源,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著述作品之性质及其作品形式之学术也。故其于批评也,必先由比较、分类、判断、而及于鉴赏;赞美、指正特其余事耳。若专以讨论瑕瑜为能事,甚至引绳批根,任情标剥,则品藻之末流,不足与于言文事矣。”^②他认为批评之法有十二种,而对其中“历史的批评”描述尤详:“叙述作者之生平与其著述之关系,更推论作者之著作思想与其时代环境之关系;更旁征其所受于前人、时人之影响,及家庭种族之熏陶,以资论断,谓之历史的批评。若仅综合其时人之意见,参以己意,则非精审之批评者所敢取也。”^③这几乎点出了后人著述古代文学史和文论史具体的程式。

再看郭绍虞,他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指出:“在此书中,固然重在材料的论述,然亦时多加以论断的地方,如文笔之辨析、八病之解释以及古文家与道学家所论文与道的关系等等,均不敢自以为是,甚愿得读者指正。又所加论断,实际也等于说明。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笔者按:即所谓‘价值判断’)。即使对于昔人之说,

① 黄保真:《回顾与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②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第6~7页。

③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第7页。

未能愜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因为,这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①从郭氏之言,我们也大抵可以见出他的方法论之基调。所谓“保存古人的面目”云云,重在“求是”,强调“史”不同于“论”,或者说采用的是“批评史路径”而非“批评路径”。谈到宋代诗话他又言:“又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如诗话之类,其性质本与文学批评不尽相同,而且一一罗举,加以考订,也与史的体例不合。这在将来,预备另辑诗话考一类的书。今此书中,在论及宋人的诗话之时仍不免备举及之者,亦不过表示一时批评界之风气而已。”^②所谓“一时批评界之风气”的重要主导者之一是胡适,当时郭著上卷列为“大学丛书”,胡作了审查,并提了具体意见,一是关于材料方面的,指出郭用《礼记·表记》孔子“情欲信,辞欲巧”而不用“辞达而已矣”,“未免被主观的见解影响到材料的去取了”;二是关于墨家名学,“此种辩证之论,正是古代哲人对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不应当忽视的”,郭在《自序》中原文照录。^③胡适的这两条意见,一是关于史料的,二是关于名学(逻辑)的,此两条本是他的一贯家法,即强调学术研究的“史料化”和“逻辑化”,容后详论。关于郭绍虞在材料上所下功夫,王运熙在郭著再版前言中有所涉及:

如他对于数量众多的宋代诗话,较早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考订,其数十万字的《宋诗话辑佚》一九三九年即有哈佛燕京学社印行出版。本书中关于宋代诗话、诗论的翔实叙述与细致分析,即建立在这种扎实的资料工作上面。郭先生对文学批评史中的不少重要研究对象,都下过深入的考订诠释功夫,如杜甫、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建国后均有笺注问世,但其工作则大抵开始于二三十年代。……在这方面,郭先生可说是继承、发扬了清代学者黄宗羲、全祖望认真编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精神。^④

体现郭绍虞文献功夫的还有《历代文论选》等,郭绍虞的批评史著述是建立在自己搜罗的原始材料基础上的,但这种做法是对黄宗羲等的学术史研究传统的继承、发扬,还是受“一时批评界之风气”的深刻影响,却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似可称之为“文学史路径”,他曾经如此描述过自己的研究经历:

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曾努力着手整理,而且有时也还自觉有些见解,差能满意;然而终于知难而退,终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文心雕龙·序志篇》之批评以前各家,议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在我呢,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愿粗鲁地观衢路。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能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最有密切的关系的。……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更没有勇气去尝试了。我所希望的,如能在这些材料中间,使人窥出一些文学的流变,那么,至少可以说是完成了一部分的文学史的工作。如此书能在这方面有些微的贡献时,我就深深地引为满意了。^⑤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3页。

②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页。

③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④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⑤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页。

张海明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一开始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其重点在史而不在论;一是服务于当今的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其重点在论而不在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总体而言,古代文论研究似乎更偏重于史的研究”,其中原因之一是“五四以来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创作实际,更宜于借镜外来的文学观念、理论予以评判”。^①研究目的落在文学史上,而批评史研究则可谓“古为古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开所谓的“古为今用”,而这是不是寻求学科发展合法性的一种重要学术策略呢?因为其时反传统浪潮正在高涨,以传统来指导现实,是很难见容于“一时批评界之风气”的。

与郭绍虞的“批评史路径”“文学史路径”相比较,乍一看来,罗根泽采取的似乎是一种偏重于“论”的“指导未来(创作)路径”。尽管他强调“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创作,必借助于文学批评;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史,必借助于文学批评史”,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文学批评史虽与文学史有关,但文学批评史的去取褒贬,不能纯以文学史为标准”,并且在谈及研究目的时特别强调“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的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②罗氏所言,看上去似乎是在采取一种“原理路径”,但对此需加具体、深入分析。

罗根泽在1927至1929年间,同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清华,他先后师从梁启超、陈寅恪读“诸子科”;在燕京,他师从冯友兰、黄子通读“中国哲学”。因此,在学术观念和方法方面,他受到梁启超和冯友兰的影响,其中受梁影响似更大一些。其《中国文学批评史·旧序》云:

余少好子集之学,长有述作之志。诸子百家,则作探源以辨正伪,作集注以明训诂,作传论以考行实,作学案以阐义理。历代文学,则先录文学家传记集,再作文学家列传,以述文人生平;先作各类文学史,再作文学史类编,以疏文学源流;先辑文学批评论集,再作文学批评史,以探批评奥蕴。^③由此而可见其传统的学术训练。罗氏治史,反对“妄以支离卑瘠之说,谬附笔削一家之言”,以为“不该不遍,不足语于实录;予取予夺,何得称为直笔?”“故今兹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④“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此言与郭绍虞“保存古人的面目”正是同一意思。罗根泽在序中对收罗、搜览史料之甘苦亦有较详描述:

窃尝以谓古昔贤俊,学贵博综,运思含毫,吐纳万象,举凡天地之大,幽明之情状,古今之嬗变,以至六府三事,众技百家,莫不随意陈辞,即事为篇。摛金振玉者,最为文集;布实达指者,汇为笔记;文集笔记者,儒先业绩之总萃,而文学批评亦寓藏其中。此外则群经子史,总集诗集,品藻之言,亦往往间出……清顾炎武谓著书譬犹铸币,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文学批评史之山铜为诗话文论,而文集笔记则为沙金;因彼开卷已得,此必排简始见也。^⑤

“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此言对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今日古文论研究中的一流弊就在反复使用一些常见材料,论来论去,做的却只是“充铸旧钱”的活计。罗根泽材料搜罗范围不局

① 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13、7页。

③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④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页。

⑤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限于诗文评,还旁及“群经子史”,对其“搜览务全”,郭绍虞曾对此大加褒扬。尤可注意者,罗根泽对研究、撰著批评史的方法论问题已有极自觉之关注,在“绪言”中作了专门的讨论。他首先认为“历史”有两种含义,即“事实的历史”和“编著的历史”,关于编著历史的史家责任,他认为有两种说法:

一是纯粹的史学家说,谓历史的责任是纪述过去。一是功利主义的史学家说,谓历史不仅在纪述过去,还要指导未来,就是所谓“以古为鉴”。惟其独重纪述过去,所以偏于“求真”。惟其兼重指导未来,所以偏于“求好”。这是一般的分别。实则“求好”亦须植基于“求真”;否则所求之“好”,不是“真好”。……不惟站在纯粹的史学家的立场,必须“求真”;就是站在功利主义的史学家的立场,也必须“求真”。“求真”以后,才能进而“求好”。

以上是就“普通史”而言,作为“学艺专史”的文学批评史,既可由史学家编著,也可由文学批评家编著:

文学批评家所编著的文学批评史,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根据过去的文学批评,创立新的文学批评。这与功利主义的史学家有点相似。一是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寻找历史的根据。这类的文学批评史,虽尚乏例证,但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其编著的目的很明显的是为的白话文学得到历史的根据。拿文学史推测文学批评史,将来也总有被人为了寻求学说的历史证据而编著的一日。

为寻找学说证据而作史,其目的本不在史,我们也无需以史看待。为创立新学说而作史,其创立新说要根据旧学说,则对于旧学说,必先明了真相。否则根据的旧学说既不“真”,创立的新学说也难“好”。所以学艺家的编著学艺史,也应先求“真”,然后再由“真”求“好”。^①

此种方法论反思,今天看来其重要性也丝毫没有减弱,针对性反而加强了。“求真”与“求好”用传统学术语言表述也即“(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可以说罗根泽已点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最基本的“路径难题”,当然“求好”与“致用”又不尽相同。郭绍虞所谓“一时批评界之风气”已被罗根泽概括为“求真”,提升到精神层面可称之为“求真(求是)”精神。罗根泽对“纯粹的史学家说”“功利主义的史学家说”“文学批评家说”均辩证视之,不分优劣,但细察起来,他对旨在“指导未来文学”的“文学批评家的编著法”其实已加以“悬置”而留诸“将来”了,他本人当时的选择显然更近“纯粹的史学家”,这就与郭绍虞的“文学史路径”极为相近了。此处尤为吃紧,因为在当时西学新潮腾涌之际,罗根泽所谓“根据过去的文学批评,创立新的文学批评”,“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寻找历史的根据”以“指导未来”,显然几无可能,时人“创立新的文学批评”之“根据”显然不是“过去”之国学,而主要是域外之西学。郭、罗二位所声称的研究目的与路径初看似有不同,但深究起来选择的却同为“纯粹史学家”立场,这固然有学科发展的规律性要求,学科草创之初,自然要先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番历史梳理,但与其时文学主潮全被西学主宰、中学主要被批判之历史文化情境全无瓜葛吗?

“绪言”接下来的讨论更可见罗根泽的史学家立场,他认为存在两种“历史的隐藏”,即“原始的隐藏”与“意识的隐藏”,而后者“由于编著者的成见。成见最要不得,特别是历史家,一有成见,则‘事实的历史’便被摈于成见以外,不易发现。成见的来源很多,最主要的是‘时代意识’”,这体现的是一种深刻的历史主义意识,研究者不仅要认识到过去人的历史局限,而且要意识到自身的历史局限并不断加以充分反思,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2~23页。

谁也不可能作超历史的全能研究,“譬如编著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者,如沾沾于载道的观念,则对于六朝、五代、晚明、五四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如沾沾于缘情的观念,则对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①我们可以引申说:对相对立的文学观念,作文学批评可以偏重、认同一种观念,而作批评史研究则需要采取相对持重的立场,如若不然的话,对“事实的历史”的描述就会产生严重偏差。再比如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简单地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对有着“形式主义”倾向的文论研究不够透彻,对相关的材料也不注意搜集,如此对古代文论史的把握很难说是完整的。而且价值评估上也容易产生偏差,比如对待明代诗学,研究者往往从重情感的文学观出发,把公安性灵派的诗学理论价值抬得过高,而对格调派的理论价值揭示得不充分,评价过低,平心而论,格调派在诗学理论上的建构是远超过性灵派的。批评史书写要贯彻历史主义理念,但是也不能极端地强调绝对客观,罗根泽指出:“祛除成见才能客观。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如法朗士所说,吾人永远不肯舍弃自己,永远锁在自己的躯壳及环境,所以没有真正的客观。”^②其实,这就是后来西方诠释学所特为强调的所谓“合理的偏见”。不过,话虽这么说,但历史的发展又确可以使我们更接近客观与全面:

但因时代意识所造成的主观成见,则以我们得时所厚,可以祛除。我们亲自看见五四以前的载道文学观,亲自看见五四的对载道文学观的革命,又亲自看见五四的缘情文学观被人革命。使我们的主观成见,由时代意识造成,又由时代意识祛除。这并不是我们比古人聪明,是古人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多的时代意识。假使见过这多时代意识的我们,仍然自锁于一种胶固的时代意识以编著史书,致使历史的真相,无法显露,不唯对不起历史及读者,也对不起时代及自己。^③

以上这些分析对今天的研究仍具启示意义。在1957年写的“新版序”里,罗先生对“时代意识”作了进一步反思:

在绪言里,我希望能由看到相当多的时代意识,而没有摆脱当时的时代意识。现在看来,这只能做到不抹煞过去的时代意识,却不能摆脱当时的时代意识,也难以超越当时的时代意识。例如对‘载道’和‘缘情’的问题,我虽希望不沾沾于一种观念,但事实上仍接受了‘五四’时代认为文学是感情产物的影响。又如时代意识的关系,我非常的强调并注意分析,但对更有关系的阶级意识却注意不够,虽然有的地方也注意到了。^④

今天看来,“五四”时期主导的新的文学观念在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上还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当时移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一度占据上风,使研究者相对忽视了对一些古代文论史中“杂文学”理论的研究,如此等等。如何面对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文学观念,在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中依然是个问题,甚至是个更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学观念。这一方面如罗根泽所说是“得时所厚”,可能使我们把历史看得更全面,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个历史的和时代的负担,使我们不知如何去取而进退失据。我们今天多大程度上能摆脱、超越自身的时代局限?我们几乎没有太大把握,在这方面能做到的只是多注意自我反思。而相对容易做到的是“不抹煞过去的时代意识”,这才能真正贯彻历史主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4~25页。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5页。

③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5页。

④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义,而如此贯彻历史主义,就必然要求在文学观上采取兼收并蓄的立场。总之,我们今天较之前辈“得时所厚”之处,恰恰不在于文学观更为高明,而在于认识到各种相异的文学观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因此不是用自认为很高明的“一种”特定文学观去取代前辈的特定文学观而走向另一极端,而是用多样化的文学观取代过去单一化的文学观。

罗根泽把作史祛除成见分成四个阶段:“搜求史料之最好的方法,莫妙于荀子所谓的‘虚壹而静’”;“选叙的标准”一要“述要”,他推崇黄宗羲的“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法”,二要“述创”,创造又分“纯粹的创造”“综合的创造”“演绎的创造”“因革的创造”四类,须分别对待;“解释的方法”分为三种,“明训”“析疑”“辨似”——此三法皆为“我注六经”,皆非今人所谓“创造性解释”,由此亦可见其“史学家”立场;第四阶段是“处理史料”,也就是“编著”,在此阶段罗根泽推崇章学诚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尽其天”是“尽依‘事实的历史’之真”,“益以人”是“编著者之任意的去取褒贬”。^①四阶段亦贯彻了罗根泽“求真”之“纯粹史学家”的立场。若细加体察,罗根泽“求好”“指导未来”云云,可谓取法乎上,悬一高远之鹄的,实际所为却是踏踏实实地从“求真”做起。

二

那么,郭、罗等先生选择以“求是”为主的史学家立场,是否仅仅只是基于“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朴学实证的治学手段”?说清楚这一问题就需要回到当时大的文化语境中去。

首先,西学东渐其实早已开始,推动这一进程的能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第一批人是西方传教士,但他们似乎很不成功,西方宗教并未对中国传统形成实质性的冲击;然后是“中体西用”,即从“用”“器”或“技术”上接受西学,但似乎也很不成功,因为这种做法似乎并不能实现挽救中国传统社会的初衷。我们今天把中国现代化真正的发动期定在“五四”时期,五四先贤们断然拒绝了对西方宗教的接受,选择了与宗教相对的“科学”。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其间宗教确实受到持续的激烈批判,但宗教却也从未从西方社会生活中完全退出。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两者之间肯定有对立的一面,但两者有没有互补的一面?五四先贤们似乎多强调对立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互补的一面,或者至少说对互补的这一面未加以深究。批判而完全摒弃宗教、鼓吹科学并将其上升到“主义”的胡适倡导的何尝不是“全盘西化”,从西方文化整体结构上来看只是“部分西化”“片面西化”。问题还不只在去宗教而取科学,更在于取“唯科学主义(精神)”而去“人文主义(精神)”,姑不论这种去取对中国整体社会的影响,至少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来看,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西方文化发展至今,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其内部绝非“科学主义(精神)”一家独大,“科学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既对立又互补,这足以表明西方现代文化的内部其实是充满差异的。不管怎么说,这种重科学主义而轻人文主义的选择,确实在包括古代文论研究在内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我们反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发展历史,无论如何考究其得失,恐怕都要追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5~33页。

溯到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去取上来。如果我们把科学主义更宽泛地视作一种重视科学的精神取向的话,那么,这种精神取向其实是有不同层面的表现,在最高层面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主义观念表现为“为求知而求知”,这是一种近乎超功利的精神倾向,而五四先贤所特有的文化焦虑、急切启蒙的焦灼心态与这种精神倾向恰恰是存在距离的。“求是”与“致用”在中国传统士人身上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对矛盾可以说更加尖锐化、复杂化了。竭力鼓吹“科学主义”的胡适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实用主义”,这极富象征意味。总的来说,“求是”与“致用”的矛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往往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除了古今、中西矛盾外,“求是”与“致用”的矛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也非常突出,并且前两种矛盾也是贯穿于后两种矛盾之中的。

再从中西文化、学术的冲突、融合过程来看,“科学”与“民主”这两种价值范畴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和学术发展走向的影响最为深刻,“赛先生”与“德先生”几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象代言人,并且成为推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主要力量。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发展过程中,“科学”和“民主”概念的使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概念指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概念则指认识过程中的科学法则、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狭义的“民主”概念指民主制度、民主精神,而广义的“民主”概念则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观念解放和革新。总体来看,广义的“科学”与“民主”流布更广,影响更大。“科学”和“民主”概念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得到提倡和流布,到“五四”作为口号被明确地提出来。鸦片战争后,为了“师夷长技”,为了履行“中体西用”,人们开始逐步学习和吸收利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则极其稀少,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甲午战争之后,严复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介绍给国人,并且在序言中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论,乃至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他还陆续翻译了《群学肆言》《原富》《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西方学术名著,介绍了西方近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等,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学习西学的热情。梁启超对当时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的情形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新思想的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消化与否,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代。^①

情况虽然如此,但是毕竟改变了旧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格局,这对于新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形成和传播起了极大作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前期准备。尤其是进化论观念的引入并逐渐被接受而取代传统的变易循环思想,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科学”观念对旧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格局的冲击,以及在促进传统思维方式向近现代思维转换方面,与“民主”观念的引进一样,起了决定性作用。被誉为“西学第一人”的严复认为: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湃,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社会进化之公理。……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②

后来胡适指出: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71页。

^② 严复:《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第1期,1907年6月。

这三十年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毁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①

可见其时“科学”地位之高。“科学”地位之高表现为上升至“主义”,此即所谓“唯科学主义”,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对20世纪上半叶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作了专题研究,兹略加引述。“就科学的全面应用来说,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各种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由上引胡适的话可略见“科学威望”之高。“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实体”,“被引进取代旧的文化价值”,五四先贤们“通过吸收科学的世界观以进行文化改革,通过实行民主进行政治改革”,可谓双管齐下。唯科学主义本为西产,它在西方也是一种“信仰形式”,是一种“带有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而“尽管中国传统在西方意义上不是宗教,但对‘旧的’(信仰、宗教和制度)批判的强度,使我们简直可以把现代中国的科学崇拜看作是一种替代宗教或宗教代替。唯科学主义首先显示出对科学力量的特殊理解,然后是对传统的批判,第三则是一种替代宗教的形式。”若论中西之别,可以说西方科学主义是从其发达的科学技术中生长出来并产生影响的,而中国的唯科学主义的影响首要的恰恰不在自然科学领域,而在人文社科领域。1923年的科玄论战对唯科学主义的盛行极具象征意义,它“是传统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之间的一场战斗。可以说,甚至在1923年这场论战开始前,唯科学论者就取得了胜利”,而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为科学作广告,使唯科学主义这一术语广泛运用于从此开始的实证主义思潮”,论战中科学家的立场本无足怪处,而科学家还“得到了吴稚晖、陈独秀和胡适等非科学家的支持”,在这次论战中,“非科学家的支持给了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兴起以明确的实质意义”,也就是说,唯科学主义的实质性影响,其实恰恰是施与非科学领域的,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科玄论战并非一场“科学事件”,而是一场“人文事件”,甚至可以说赢家不是“科学”而是“人文”——当然是被科学主义主宰的人文:

论战后的几十年中,唯科学主义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由于过去30年中唯科学主义的因素,思想和情感对‘科学作为教条’的依附在规模上增加了,并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科学崇拜’是三四十年代这种现象扩大的绝妙写照。科学随着新的科学学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后者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观念的)的成熟而更加流行。^②

其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化”进程大大加速,至今我们恐怕还处在这一加速进程之中。郭颖颐先引丁文江语“在知识界里科学无所不全。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是方法问题,不是材料问题。凡是世界上的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然后分析指出“这种信条预先设定科学方法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从不变的物质到感情和情绪”。^③陈独秀《敬告青年》就曾指出:“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

①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2~3页。

②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10、19、26、12~13、135页。

③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则,以定其得失从违。”^①因此,人文社科的“材料”也可以诉诸“科学法则”而用“科学”这种“方法”加以研究。形象而略带夸张地说:经过一场论战,信奉唯科学主义的科学家应回到实验室去实验,而信奉唯科学主义的“非科学家”如胡适则钻进故纸堆去整理国故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唯科学主义”的突出影响首先表现为“历史观”的科学化,而此科学化几乎也就等于历史观的“现代化”;当然也可以说,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突出地表现为“史学化”,或将人文学科涉及的一切文化资源进行“冷处理”而使之“史料化”。

梁启超就一直倡导一种科学的、进化论的史学观,他在日本通过阅读大量的“东文”书和“译本西籍”,对西方科学、学术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并且致力于用西学中的科学理论、方法、精神等来改造中国传统旧学。梁启超是这样描述“新史学”的:“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矣。历史与历史哲学殊科,要之,钩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②这种近乎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史学观,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旨在总结兴亡治乱之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旧史学观。梁启超又倡导进化论的史学观,其《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有云:“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③又《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者也。……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门迷信之论,尽失所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④他还以这种进化论的观点批评传统史学中的“倒退论”“循环史观”,他在《新史学》中云:“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⑤这种科学主义、进化论的历史观,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著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追求宏大的史学建构的倾向,这种宏大而系统的建构,显然不是“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朴学实证的治学手段”所能范围的。而以上所述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发展的重要的文化语境,由这一大的文化语境来看,很难说这一学科建构之初所呈现出的重视求是、实证的学术品性主要是源自传统朴学。而欲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拿一方面推崇“全盘西化”另一方面鼓吹“整理国故”的胡适作例子来分析,大概再恰当不过了。

三

一定程度上说,“求是”与“致用”的矛盾,乃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学术发展所遭遇的最基本的“路径难

① 《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

② 《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40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79页。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14页。

⑤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

题”。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指出：“晚清学界之争论，有政治路线（保皇/革命），有门户家法（今文/古文），有文化理想（中学/西学），更有将三者混为一谈的‘求是与致用’——后者因其抽象与含混，跨越不同的时空，成为20世纪中国学界的共同话题”，或许并非“因其抽象与含混”而“跨越不同时空”，而是因为“求是与致用”对于中国现代人文学学术来说确实是长时段一以贯之的话题，诸多话题都隐含在这一话题中，并且通过这一话题而有所表现。因此，以此来审视中国人文学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当是较为恰切的。陈平原还把这一路径难题放置于更长的时段中来分析：

“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虽说为人为己、成德成学、有用无用之类学术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比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既包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

“求是”与“致用”的断裂，或许恰恰昭示了现代性的某种断裂？章太炎标榜“学在求是，不以致用”，陈平原分析道：“在今古之争中，章太炎明显扬‘求是’而抑‘致用’；可在自家的学术研究（佛学研究、史学研究和小学研究）上，章太炎又突出‘致用’精神”——“求是”与“致用”还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断裂的。我们再看胡适，“求是”与“致用”的矛盾贯穿其一生，陈平原举例分析道：“有人邀请他参与发起‘中国学会’，胡适拒绝了，理由是不赞成其借学术谈政治的会章”，他认为“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情感的作用”，“同有此人间情怀，同样关系民生疾苦，胡适宁愿在政论时评中体现其政治意识，而在学术著述中仍严守‘实事求是’原则”。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说，所谓“致用”往往最终就落实为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古今中外皆然，可以说胡适采用了“两副笔墨”的策略来化解“求是（学术）”与“致用（政治）”之间的矛盾，“为了强调政学分途，胡适不免过分突出学术的‘纯粹性’”，“重历史而轻现实，重文史而轻社科，重训诂而轻义理，重知识论而轻价值论——后者都因可能接近现实政治而被视为‘非学术’，胡适治学的路子只能越走越窄，最后走到花二十年时间研究一部《水经注》”。^①由此看来，“两副笔墨”的策略并未能很好地化解“求是”与“致用”之间的矛盾。“实事求是”而非“发扬民族精神情感”，是胡适整理国故的基本旨趣所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他的作法与所谓“保存国粹”截然区分开来了。其实，从基本态度来看，胡适不仅不是为了“发扬民族精神情感”，而且对传统的民族精神情感一直是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分析道：“虽然胡适领导着这一沿着科学发展线索来系统对待民族遗产的运动，但他还是劝告青年转向别处”，“等你们在科学试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还指出：“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而整理国故就是要“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②——胡适当时的“整理国故”引起了新文化阵营里许多人的警惕，“打鬼”“捉妖”云云自然有解释、辨白之意，但确实也

①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28、46、143、145、146页。

②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85页。

绝非仅仅只是策略语,而是体现了他的基本态度——这种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影响非常大,也同样影响到当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比如孙俔工在翻译日本人有关古代文论研究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序言中就指出“我译这书的意思:并不是如现在的时流所唱的保存国粹整理国故一样”,“他们只是盲目地崇拜古人,笼统地把古人底成说当作深微奥妙的神怪的天经地义。殊不知一种学问总是由人造成的。既能由人造成,也就由人可以自由地去研究去评论,并不是怎样神圣,怎样玄妙微通深不可识的。换言之纵令是一种很艰深的学问,只要你切实地用心去研究过,也就成了一种‘不过如此’的东西了。”^①“不过如此”当是胡适所谓“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的简单概括,可以说这是一种西方人所谓的“祛魅”的态度,而“祛魅”是科学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功能之一,也是现代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对前现代的文化所产生的最大影响之一。总之,“科学地整理国故”就是要把国故视为冷冰冰的“史料”而进行“冷处理”,一不可“感情用事”,二必须“祛魅”,如此处置,人文之遗迹就与自然之遗迹无异矣。

陈平原分析道:“在20世纪初的中国学界,‘科学方法’几乎成了胡适的‘专利’。《论国故学》提出的‘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境界、《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的‘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以及《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的‘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所有这些加起来,大概就成了‘新青年’心目中的‘科学方法’。为了使‘科学方法’能顺利地在中国传播,胡适借助于清代考据学传统,且将其简化为‘拿证据来’。”^②胡适在这方面似乎采取了近乎西方“文艺复兴”的路径,但《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准确地分析指出:“胡适把现代科学方法与清代学者的经验主义等同起来,似乎有些牵强。当胡适自己指出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本质不同时,这种等同的浅薄处就不言而喻了。”^③实话说,“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本质不同”不在“方法论”,而在“世界观”或“文化观”:西方文艺复兴推崇的是古希腊的文化精神,是一种“接续”,而在整理国故的胡适看来,整理国故绝非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某种“接续”,而依然是一种“断裂”。叶维廉也指出“五四的精神之一,便是实证实悟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又引李长之《迎中国文艺复兴》语指出,“五四运动并非‘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古代的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艺术方式的再生……可是中国的五四呢?试问复兴了什么?”^④如果只从技术的或“方法论”理念的层面来看,西人科学与清人朴学确乎存在相通之处,但在“世界观”或“文化观”层面上,两者其实迥然有别:“科学精神”于西人而言也是一种基本的“世界观”,但于清代朴学大师们而言却非基本“世界观”,囿缚于其社会历史处境,他们基本的“世界观”只能是前现代的,与现代的科学主义世界观还是存在不小的距离。这一点通过分析所谓“中体西用”更可以清晰得见:“用”者,科学技术也;“体”固有多重复杂涵义,但似应包括基本的“世界观”“文化观”。“中体西用”论基本涵义是:“用”不妨西化,而包括基本世界观在内的“体”是万万不可西化的。反之,“全盘西化”云者,主要还不是指“用”的西化(唯科学主义产生影响最大的领域恰恰不是科技领域即是明证),其独特意义恰在“体”的彻底西化(所以这种西化的意义是文化层面的而非技术、方法论层面的)。胡适的整理国故恰恰贯彻了“体”的西化这一理念,也即用西方现代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改造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其利其弊均在此,而

① [日]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孙俔工译,北新书局,1929年,第2页。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

③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8页。

④ 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1页。

非在所谓研究方法上。当然,这种“体”的西化用“西体中用”来概括也未必准确,“西体中用”尚是一种体、用二分的表述。西方现代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精神的特点在于:将本是特殊的法则(law,或所谓“规律”云云)普适化,也即将本来只是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某个特定领域(科技)的法则推及至所有领域,进而提升为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整体的基本的“世界观”或“文化观”,这是将“用”提升为“体”,或者说将方法论提升为世界观,这同时也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其利其弊也均源于此。对清代朴学来说,恐怕很难说重考据的方法论已上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因为我们又怎能说在乾嘉之时,“科学”已上升为某种“精神”并大行其道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呢?而对现代中国来说则近乎如此。总之,朴学的“科学方法”尚限定于“用”,而唯科学主义既体现为“用”(方法论等),更体现为“体”(世界观、文化精神等),以唯科学主义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用”的西化,同时更是“体”的西化,此中“用”与“体”是相应的,在此意义上,可谓之“全盘西化”而非“部分西化”。基本结论是:胡适的整理国故,在方法论上似乎中西兼顾融通,而在世界观、文化观上倡导的则依然是全盘西化,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现代学科的产生所体现出的基本文化精神大抵也是如此。“整理国故”与“全盘西化”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其实遵从的是同一种文化逻辑,胡适的思想可谓一以贯之,并无大的转折。

总之,以上粗略的梳理表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最基本的文化背景,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不同的研究者,或偏于传统朴学,或偏于现代科学,对传统文化、文学理论的情感认同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影响上来说,这门现代学科建构的主要动力,是来自西方现代科学主义精神,而非中国传统的朴学精神。暂不论科学主义的流弊,科学主义精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现代建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在科学主义精神的庇护下,这门学科才得以顺利建构并获得较好的发展,尽管同时也留下了诸多隐患。对于学科发展的历史是需要经常进行检视、进行反思的,这里所言说的只是一些初步的思考认识,更深入的(尤其是结合当下学界研究传统文史中呈现出的“汉学心态”)通观分析,只能待诸来日了。

责任编辑:李彦姝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PC had given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and action logic, so as to 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and finally point it to the fat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iv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a banner of CPC's theories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Just based on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in wartime, CPC gave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ique meaning, formed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action" in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u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unique conceptual symbols.

Keywords: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conceptual discourse; CPC

On "Teacher" and "Student"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PC's History

Yu Anlong

Abstract: "Teacher" and "student" are a pair of phra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widely used by people in life, which is usually a description of a kind of social relationship. In CPC's discourse system, "Teacher" and "student" not only have the meaning of apprenticeship, but also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s used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particularly widely use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eacher" and "student" have different emotional color, and we need to analyze and study it based o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ituation.

Keywords: CPC; characteristic discourse; "teacher"; "student"

Between "Truth-seeking" and "Practicality-seeking": A Review of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ang Shengyuan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Western Scientism, the radical trend of anti-tradition and r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were formed in the May 4th period, which promoted the ris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directly. "Truth-seeking" and "practicality-seeking" are two different ways of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ose two methods derived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and caused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path of writing, thinking pattern and theoretical character. The focus disputed rest in the historical principle of truth-seeking need pluralistic vision, and true historicism is related with pluralism and relativism. Practicality-seeking, however, would deviate from the objectivity of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Chen Zhongfan put forward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Guo Shaoyu advocated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Luo Genze advocated path principle. All of them have focused on historical principle of truth-seeking. Hu Shi's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seemed as a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he tended to obey the principal of "practicality-seeking".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subject was created between the principal of truth-seeking and practicality-seeking.

Keywords: truth-seeking; practicality-seek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icism; path problem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ulture Break-in" and "Broad-wid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Jikai

Abstract: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plicated and constant "breaking-in" journey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has begun. It has also formed an "ideological trend of culture break-in" which is universal, lasting and complicated. Furthermore, it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China's new democratic culture movement, socialist culture movement and other literary phenomena. With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ulture break-i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Century Literature" of our country has a diversity literary form. However, it also reflects a more serious dual opposition of ideological trend. This trend intending to resist "breaking-in", not only jeopardizes the cultural creation of "Broad-wide Modern", but also has a negative effect of literary creation of "Broad-wide Modern".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ideological trend of culture break-in; "Broad-wide Modern"; culture creation; literary form

英文译审:汪立峰